

「大家」寫作 新時代與新媒體

騰訊的「大家」平台從去年十二月開始營運，每天發表十多篇文章，並在微信帳戶中，每天精選五篇文章供大家閱讀。今年六月，「大家」已與229位作者簽約，發表獨家稿件1200多篇，平台總發文量超過2000篇。半年發表2000篇文章，「大家」的發稿量超過中國任何一家原創媒體。讀者對於「大家」的關注遠超乎想像，微信的獨立訪問用戶數達百萬人，而某些文章的曝光量也非常高，如單田芳的〈言歸正傳話隋唐〉一文，曝光量達到了3000萬，連岳〈中國人，你要學會少管閑事〉的曝光量也接近600萬。

「大家」的文章主要以社會、時政、民生、文化題材為主，作者來自兩岸三地，香港人熟悉的梁文道、馬家輝也是作者之一。最近，「大家」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了一場筆會，多位作家齊聚一堂，分享「寫作的可能」這一主題。本文節錄其中一些精彩內容，與讀者分享。

■文：Christy

羅世宏：網絡寫作的可能性

數字時代也要強調一個平台跟編輯的重要性。在這個作者飽和，但是讀者稀缺的時代，我們不愁沒有信息、資訊、文章可讀，我們愁的是有太多文章可讀，不知怎麼選擇。要能夠鑒別或者能夠確保好文章，作為作者，編輯的角色特別重要，因為作者每一篇文章都得到非常嚴肅、認真的對待。嚴肅、有深度的文章為甚麼在網絡時代這麼重要？正是因為在信息爆炸、風險不確定性愈來愈高的年代，我們更需要一些頭腦清醒、有自覺、有獨立判斷力、願意去研究問題、表達想法的作者。當然作者跟讀者的身份，因為科技的關係而重合，很多年輕人或者有潛力的人也可以從讀者身份轉化為作者，被挖掘的可能性比過去高得多了，而且網絡沒有篇幅跟時間限制。如果我們要在網絡上發表1500字、2000字、3000字或者6000字，事實上比傳

統報刊的可能性更大，應該要去鼓勵，去爭取這樣一個空間。在過去傳統報刊時代，就曾經有編輯做這件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高先生（高信疆）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就展示了一個編輯的風範，說他願意刊登余英時先生長達2萬字的文章在副刊上。副刊是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也可能是最有思想性、對社會觀察最透徹，而且文字最犀利的一個空間。正因為高先生這樣一個人物的存在，所以包括像李敖、柏陽他們出獄的時候，也在高先生的邀請下，在副刊上發表文章，而且文章都不短。更近一點的例子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龍應台旋風，龍應台幾千字的文章不時在副刊發表，《中國時報》造就龍應台，我想相當程度是符合事實的。

馬家輝：擺脫傳統出版的限制

我聽到很多關於印刷出版的問題，但同時我卻看到很多非常深刻的書，不管是小說還是論文、學術研究，政論也好，都能夠出版，甚至以更有效的方法來出版。我覺得整個市場的概念，特別是大中華市場的概念，還有跟互聯網的互動等等，其實能夠支撐更多不同類型的出版，當然要去摸索，比較不像以前說幾乎哪一個大師的名字，不管是小說家還是學者，只要他的名字出來，他的書保證能賣，現在沒有那麼輕鬆了。比方說不管你說出版衰敗也好、死亡也好、凋零也好，這不一定代

表作家的衰敗。因為整個模式轉變了，剛才說到盜版的問題，我前一陣碰到林一峰，他說最近出了一張唱片，我跟他談盜版的問題，他說沒有關係，我幾千元賣給不同省份的人，給他們去散播，他說最重要是我的知名度，已經沒有辦法靠唱片來賺錢了，可是有了知名度，而且在不同省份跟不同的機構合作，獲得收入的方法是另一種渠道。我想作家是不是也能這樣，演講、活動，用其他的方法去賺錢，這不表示你沒有機會去寫，只是你不用依賴某些出版社來判斷你的書能不能出。

在筆會上，大家踴躍提出意見。



邱立本、錢鋼等人探討寫作的可能。



邱立本：主流社會的中文寫作

我最近在「大家」裡面談到關於對香港民間中國的回憶，談到唐君毅先生、錢穆先生，我家住在深水埗附近，回憶整個二戰之後，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90年代，我覺得香港扮演很獨特的角色，香港在寫作方面能夠保持民間的力量。小時候看報紙，主流的刊物都是以國民黨、共產黨兩大力量為主的，但是總是有一些民間力量在不斷地寫作，包括《明報》跟《大公報》關於中國要不要搞原子彈的筆戰，包括唐君毅跟錢穆在對中國文化的論述。政治之外，還有關於流行文化方面的論述，或文化娛樂方面的寫作，大家所熟悉的金庸或者是梁羽生、古龍這些武俠小說作家，他們能夠在香港建立對傳統中國的論述，還有很多想像。總的來說，香港過去在中國內地，甚至整個國共文化戰場都擔當一個角色，就是要回答一個問題：中國往何處去。以前在冷戰時期，兩地的思想是南轅北轍，大家對中國的論述也不一樣，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到今天，兩岸的核心價值愈來愈接近。

剛才很多朋友談到我們有很多自由限制，用魯迅的話說我們還是帶著鍊銬來跳舞，但是如果我們的舞姿夠曼妙的話，是否可以跳出一個更新的舞蹈。我們談中文寫作，我們怎麼樣跟世界上最強大的英文寫作做一個對照。現在歷史上，全世界學習中文的人數是最多的，但是我們整個文字內容、所提供的論述、軟實力夠不夠呢？作為一個留學生，我發現在西方英文體系裡，它能夠有大量的學問、大量的能力來解釋中國，包括我們今天學中國歷史，我們學中國歷史的人到美國唸中國歷史是因為他有大量的史料，他有很多很強的方法去學。但是我們現在的中文寫作，我們有沒有能力寫西方主流的東西？

文：余綺平

保姆攝影師

她的正職是保姆，下班後是街頭攝影師。她才華橫溢，作品張張感人；她鏡頭下的黑白世界，可以媲美大畫家梵高筆下的鮮艷畫面。她名不經傳，直到六年前始被人發現，如今她的照片價值千金。美國業餘街頭攝影師薇安·安邁爾（Vivian Maier, 1926年-2009年）拍了逾十萬張照片，其中包括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



馬尼拉、曼谷、北京、埃及和意大利，但沒提到香港。

BBC最近放映安邁爾特輯，介紹她的生平和作品。節目主持人說，安邁爾曾環遊世界，去過香港。在BBC這套影片裡，赫然發現有一張安邁爾拍於香港大澳的照片。片中，一名妙齡村女依偎魚棚沉思。

安邁爾擅長拍攝街景，她的大部分照片拍的都是芝加哥和紐約的街頭。相信她旅遊香港期間，一定拍了許多香港六十年前的街景。可惜，上網遍查中、英文網址有關安邁爾和香港的蛛絲馬跡，一點也找不到。

這是香港重要的歷史圖片，有心人（香港特區政府）不妨與美國方面聯絡，購買或借用照片，作公開展覽。

安邁爾出生於紐約，母親是法國人。四歲隨母返法定居，十二歲再回紐約。二十四歲返法探親，開始拍攝她的第一張傳世照片。

她在法國逗留了一年，翌年（一九五一年）返美，分別在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的富裕猶太人家擔任保姆。周末放假，她掛著一部徠卡（Rolleiflex）相機，穿梭於這些城市的大街窄巷，拍攝街景和各式各樣的人物。鏡頭下，有小孩在公園玩耍、街角孤獨的流浪漢、昂首闊步的紳士，開懷歡笑的黑人。

一九五九年安邁爾辭職返回法國領取遺產，順道周遊列國一年。據英文《維基百科》介紹，她去過

BBC節目訪問了安邁爾曾經照顧過的孩子。其中一人說，安邁爾房間雜物堆積如山，紙盒有二百個，除了收藏相片，還有報紙和她拍攝對象的談話錄音帶。安邁爾每換一次新工，都隨身帶著這批物品。

安邁爾晚年一度淪為無家可歸者，依賴社會救濟金過日子。後來，被她帶大的孩子集資買了一個小單位，供她安享晚年。

安邁爾曾經租用了五個儲物倉庫，收藏她一生所拍的照片，有十萬張尚未沖印的黑白底片、兩萬張幻燈片和數以萬計的菲林膠卷。這些照片，從來沒人看過，甚至連安邁爾本人也未觀全貌。

二零零七年八十一歲的安邁爾因沒錢繳付儲物倉費用，倉主將她的物件當作垃圾，運去跳蚤市場賤賣。芝加哥歷史學家馬盧夫（John Maloof）正研究當地公園的歷史，他買下部分照片後，驚為天人，開始在博客上介紹安邁爾，引起世人注目。

二零零九年安邁爾逝世。最近幾年她的作品分別在英、美、德國、丹麥、挪威和比利時展覽，西方報紙都喜歡選登她拍的照片；兩年前一本名為《安邁爾：街頭攝影師》（Vivian Maier: Street Photographer）的書也出版了。

香港人越來越喜「閱」

新鴻基地產連續第二年進行「新地喜「閱」指數」問卷調查，以分析香港市民的閱讀習慣、對閱讀的觀感，及探討整體的閱讀風氣。結果顯示，閱讀已經是香港人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香港人愈來愈喜「閱」。

調查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透過電話訪問了1000人，今年「我的喜「閱」指數」為5.1，較去年的結果（4.81）高。

調查顯示，傳統印刷書仍是閱讀的主流，有閱讀習慣的受訪者中，表示只閱讀印刷書的仍佔多數（61.2%），但較去年的比例（71.7%）低；而表示只閱讀電子書的則佔7.1%，較2012年的3.2%大幅上升超過一倍。由此可見，閱讀電子書漸成趨勢。

調查機構指，「我的喜「閱」指數」的平均數值為5.10，閱讀風氣只屬一般，反映出雖然愈來愈多人有閱讀習慣，但由於閱讀是個人的行為，未必能感受到社會整體的轉變。

另外，有閱讀習慣的香港人，平均每週會閱讀4.7小時，過去半年平均每人閱讀6本書。至於有閱讀電子書習慣的受訪者，閱讀數量亦由去年的2.3本上升至3.3本。這些數據顯示香港人較去年更投入閱讀。

今年的研究結果同時發現，15至34歲受訪者閱讀電子書的達42.6%，比率較其他年齡層高，反映年輕人對電子書的需求較大，而且受訪者普遍認為市面上電子書的種類不足，因此，調查機構建議書商可提供更多選擇予讀者，抓緊未來閱讀的趨勢及出版業的商機。

在大中華地區，香港與台灣的閱讀比較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指標。根據今次研究的結果，香港人在閱讀消費方面，遠遠超過台灣。數據顯示，香港市民平均每月用於



今年的喜「閱」指數上升了，但閱讀風氣仍屬一般。



調查機構公布今年的喜「閱」指數。

購書閱讀的開支，約為120港幣。而台灣方面，根據「台灣閱讀大調查」的資料顯示，台灣人每年購書開支約384港幣，則每月約花32港幣買書。

調查結果也反映出廣大市民的閱讀習慣與機構組織化推動行為之間的關係。在這之中，商界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例如，《讀書好》月刊的免費推廣活動等，都激發了市民從不同的途徑得到閱讀的信息和機會。另一方面，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依舊成為市民直接取得紙質圖書的三大渠道之一。可見，書展這一模式，已經是香港人閱讀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文：徐全